

三、重点摘录

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理上的差异，是就它的理想形式来提出的：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

运动的方向可以归因于环境：它决定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的无可估量的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我们既无法证明，也不能描写。但是变化本身，撇开它的特殊方向和特别表现，简言之，撇开语言的不稳定性不谈，那只是由时间引起的。所以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比较语言学家如果不想成为令人烦恼的幻觉的牺牲品，就必须贯彻这一原则。

语音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我们不能说那是语音变化，而实是音位的借用。

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地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两种语言由于它们有共同的过去，会保存着若干可以证明它们的亲属关系的特征，但是因为双方都是独立发展的，一方出现的新特征在另一方是找不到的（除非分隔后产生的某些特征，在两种语言里偶然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那些由于蔓延而交流的特征排除出去。一般地说，一种在地理上不相连接的地区发展的语言，和它的亲属语言相比，都有一套独有的特征。如果这种语言又发生分裂，那么由它发展出来的各种方言就有好些共同的特征证明它们比其他地区的方言有更密切的亲属关系。它们真正形成了离开主干的另外的枝条。

四、个人思考

作者提出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时，他说到这是语言学中最先被看到的，是人们对语言进行科研的最初形式：在差异的语言中寻找相似是人类的本能，由此可以发现亲属关系。由于作者的教育环境、学识眼界都与我相去甚远，我难以研读其所列举的论据，但我能却依然能够体会他的论断的真实性。往前说，许多古诗的朗诵需要我们带入作者所处地区及其方言，才能感受诗歌的韵味和魅力；往后说，带有方言气息的视频正越来越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消遣。就电影领域而言，从表达上讲，《金陵十三钗》因吴侬软语而更添年代气息和氛围感；从内容上讲，《窈窕淑女》讲述了一个下层阶级女孩由于口音的变化而成为贵妇的故事。电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表现？正应了作者的话：语言的地理差异是最先被看到的。语言差异带给人们的直观冲击，也是最大的。它直接地给出故事的地点，让人们联想到那里的水、那里的土。它不是那么直白，却又那么直接，没有一点弯绕。而寻找相似、认归体系，则成为我们地域归属感、集体认可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与说同一种方言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乡音无改鬓毛衰”是漂泊游子的挂念和坚守。再把范围扩大一点，从同一种方言扩大到同一种语系，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种牵连。“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衣带水的邻国从我们的语言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又对这种源语言怀着尊崇。差异和亲属关系，带给我们丰富的语言体验和情感体验。

文学语言和地方话的关系，也许是和我们当前社会现状最相关的，也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之一。文学语言和地方话，本是不相斥的两个存在。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地方话彼此之间产生较大差异时，文学语言就一定会出现，作为不同地区人们联系的工具，便于沟通、交流、来往。不过它的普及需要一定的时间。作者说，有很多居民可以成为既会说文学语言又会说地方语言的人，在我看来，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地方语言保留了一个地区的许

多多的历史信息、传统因素，承载了文化和民族的魂，既具有生活使用价值，又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文学语言便利了整个国家的沟通和流动，使这个国家日趋紧密。在我国，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在很多地方，地方语言正成为“濒危语言”。当东北人不再会说东北官话，当广东人不再会说粤方言——我们该去何处寻找我们的根呢？

一个地区除了文学语言和地方话两种语言的存在之外，还可能因为迁徙、殖民等种种原因，出现多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情况。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语言是为了进行研究设定的理想结果，事实上，如果把每一个特征都计算进去的话，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语言的种类数量甚至可以多过地区的数量。外来语言与本地语言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他们并不绝对混杂，也不一定完全按地域分散，而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呈现不同的分布模式。在古欧洲，这种情况尤为突出，直到今日，欧洲依然有很多地区上并存着多种地方话。不论这些新来的语言是凌驾于当地土著语之上，还是通过一种和平渗入的方式渐渐融入进当地的语言体系中，这些新来的语言以及带来这些语言的人，都给当地的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的语言能够教会一个地区的居民学会包容、尊重，在差异的前提下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语言并为之自豪，在交流中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取其精华。当然，外来语言的渗入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土著语言产生冲击，或者造成当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产生间隙，当地土著居民可能因为自己的当地语言而倍感骄傲，因他人的语言或口音而产生歧视。这不只是理论上假设的影响，而是实实在在每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当然，如果土著语和外来语差距太大，人们就会自然地使用起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文学语言。深圳就是如此，深圳并存三种土著语言：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从全国各地，乃至从全球来到深圳，于是文学语言——普通话反而成为深圳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却慢慢在深圳的国际化进程中衰退了。

当作者解释地理差异形成的原因时，这一编就进入了最有趣的部分。在这里，我从概念、原理上的学习进入到思想和方法层面上的学习。论证时间是影响地理差异的因素时，作者采用假设方法，设定了两个理想的小岛，简化其语言特征为 a、b、c，用分类讨论的思想阐释了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得出结论：语言跨地区传播前后都会创新；地理因素不能单一的造成语言的差异，时间才是造成这种差异最重要的原因。作者在这里把时间作为一个维度，加入到语言差异的地理图式上去，从而形成三维立体的坐标，用数学方法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原理。后面几节同样可以利用数学的思维加以理解和解释：作者对时间在相连地区的效能的思考与描述，我觉得与积分极为相似，可以借此更好的理解相连接地区语言差异及变化的规律。一个相连接的地区，就像是一个连续的域，演化过程处处不相同，且演化采取连续、创新的形式，好比在区域上进行一个单调函数的二重积分，得出不同结果，也即是形成各种性质的方言；同时，没有自然界限的方言和微分非常类似，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如果我们要抓住一个语言的所有特征，那么它集中于很小的一个点，而这样的点数量很大，布满整个区间，就像把那个地区分割成很多极小的地区，每个地区一个方言；只抓住一个特征，这样的地方语言能够成一个区域。所以说，方言没有自然界限。

作者上一个论证过程中还利用了两个工具：波浪理论和语言地图集。波浪理论的原理类似于地理中的等温线，即“等语线”上的地点具有某一相同的语言特征。当画出多条等语线时，就形成了多个波浪，隔开了波浪的两侧。这两侧的语言显然就有明显的分歧，形成两种土语，当这种情况出现得足够多、形成一个地区的周界线时，方言就可以由此判定了。这是拨开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后，可以看见的方言的本质。希望这个地图集上的方言，永远繁密，闪耀如星，留存住我们最珍贵的文化和回忆，让我们保持对多样性和差异的尊重，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都能平等发展、共同繁荣。

作者提出的交际力量和乡土根性，进一步完善了前面的论证，使方言的产生、发展、差异、连结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作者认为这两种力量对立统一，能够归结

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力量的负方面。我不理解为什么作者这里说是负方面；相反，我认为力量统一在均衡点旁的一个范围内浮动。因为作者已经说到：“这两种力量发挥效能的结果如何，是无法预见的。”那么负的方面又是从什么根据提出的呢？是以什么为标准判定为负呢？而综合作者的描述和交际、乡土根性的定义与作用途径，我们可以发现：交际带来传播，传播促使创新，创新利用交际又进行新一轮的传播。就像某地特有一个读音，交际使得人们把这个读音带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的土语吸纳了新的部分，产生了创新；创新的人们又借助交际把创新后的语言带到别的语言的范围内去。乡土根性帮助一个地方的土语在吸纳、创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内容，不至因语言的交流而失去原本的特征。乡土根性的存在使得交际中途停下来，土语所在的地区依旧是一个紧密的整体。至于是统一占据上风，还是对立占据上风，就要看这两种力量在不同地区各自的强度了。既然强度不定，自然难断其为负面了。所以，这是我不理解或者说不赞成作者的一个点。

语言地理性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前面提到的乡土根性及其带来的地域归属感，还在于一个民族由此区分自己和其他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差异彰显着一种民族属性。在种族混杂的地区，人们往往可以通过种族间样貌的差距很快作出辨别，区分自己民族与其他民族；然而，在同一个种族聚居的地区，如果人们不依靠语言，则很难区分不同的民族，人类历史早期更是如此。不过，我们的祖先早早就进化出了语言能力，由此便利了民族的区分，加速了民族的分化和发展。早期的人们相信语言是一种习惯，一种风尚，不同的语言则是不同受不同风尚影响的结果。这个想法在本质上没有错，因为没有人的语言是像种族那样受基因决定的，而是落地之后慢慢学习的，具有可塑性。然而，即使人们不把语言的民族性和种族进行混淆，也可能会对两者有着同样的不正确态度和行为——歧视。种族歧视是一个古老的、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有的种族因为外表、肤色等等原因就对其他种族产生歧视；而语言的“歧视”似乎更公平一点，因为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民族的语言是最高级的，其他语言都比它低劣一等。不过，语言的民族“歧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地区交流的增进而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族语言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我们所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种族也可以像民族语言一样，变得更加平等。

五、读后感

地理语言是语言中一个既普遍又有其独特特征的现象。全球语言的差异和多样性自不必说。中国人口数量大、土地面积多，各式各样的方言在华夏大地上出现、演化、发展，和地理、历史等因素一起造就了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组成了五彩缤纷的中华文化。阅读本编，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语言学 and 地理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又对语言学的研究有了初步了解。

本书是我转入中文系后读的第一本关于语言的专著，初读时感到略深奥，难以理解和思考。而当我拿出纸笔，一边阅读一边总结内容、作札记的时候，渐渐意识到这本书的趣味所在。从前我对虽各地方言充满兴趣，喜欢聆听、模仿、揣摩各方言的相似和差异，但是没有系统了解过关于方言的相关知识。然而我是幸运的，有机会阅读到这本教程。原来，语言的研究并非是简单的总结规律，科学研究用到的手段这里也一样可以有，比如简化、假设、建立模型。看似自然发生的方言里隐藏了那么多的奥秘，时间在这场语言的盛宴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语言也可以用数学思维进行思考...它打破了我原先对于语言研究的认知。语言的世界很广大，感谢有一本好书引我入门。希望经过以后的学习，我能丰富相关知识、增强专业素养，更深入地理解这本书，使之真正转化为我的心智的一部分。

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2020 级汉基 1 班李岩

浅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部分后，我对地理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理解更深了几分，在考虑选题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地理语言学，我个人对地理有浓厚的兴趣，也十分好奇地理和语言究竟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联。

粗略地读了该部分，才发现与其说是地理语言学，不如说做地域语言学，我们所说的地理包括了地域和其他地理元素，但在这本书中，明显语言和地域的联系更为密切。

我们要想讨论地理和语言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语言是什么。个人认为语言是个类似于区别词的存在，我们所说之语言的差异产生语言，语言的差异产生语言，听起来十分奇怪，甚至难以理解。但其实很好理解，语言在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产生了形成的基本条件，在交流条件很差的年代，各地形成了自己的交流方式，此时的交流方式我认为不能称为语言，在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字和语音不能称之为语言，只有各个地区在不断碰撞融合中，交流方式的差异。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概括整个世界的两个个体。读地理语言学部分，让我感触颇深，初读时认为地理语言学无非是地理环境，粗读之后又觉得其实只是时间再影响，反复阅读才发现不能一概而论，可以说空间包含时间，时间又包含空间，空间通过时间的变化影响语言，时间通过空间的迁移影响语言。但我个人观点和作者的观点有一致性，即认为空间是主导因素，因为地理要素对语言的影响是可变的，甚至说是只能影响语言的特定部分。

虽然说地理要素对语言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同样不可忽略。不同地形地貌的发展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气候类型、土地类型、植被类型、生物类型等等，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比如黄土高原地区，因为地形千沟万壑、风沙肆虐的原因造成当地人民说话靠喊，语言宏厚有力，粗犷豪放。再看江南水乡，水乡、水乡河湖众多，气候温润，雨水连绵，导致当地人说话轻且细，吴侬软语好一番温柔。地理要素包括的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的自然条件对当地人文环境也产生和深远影响，在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影响下，各地的语言特点也不尽相同。

同样的地理要素对语言的分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拿我国南方举例，南方方言种类多，语言系统丰富。自然地理要素影响深远。一方面，南方河湖众多，水系发达，在很久以前河流是隔绝地区交流的主要障碍，当时水上交通不便，河湖两岸不便来往，相互隔绝，从而即使只隔一条河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体系。另一方面，南方山高林密，人们大多只活动于自己的生活圈，与外界交流甚少，从而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体系。

说完地理要素，来回归我们今天的正题，即我和作者都认为的，地理语言学中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时间。时间的影响作用，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带来的地理要素的改变影响语言和时间带来的人类文明交流影响语言。时间带来的地理要素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地理要素的影响，这里就不过多赘述，时间带来的人类文明碰撞其实也很好理解，人类最开始相互隔离，只用自己一小块领地的交流方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人类沟通能力的加强和大陆的碰撞组合，使人类相互联系，即会出现文明相互碰撞带来的语言相互交融，这种碰撞可能是相互的，也可能是一种近乎压制的侵略性碰撞，即侵略。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近代的日不落帝国在侵略的过程中不断地把英语向外传播，影响至今，世界最广泛

被使用的语言就是英语，而英语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各地随着时间和地理要素的改变又有自然的改变和创造性的改变，这即体现了第一种时间对语言的作用，又引出了我即将阐述的第二种影响，即时间使语言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我这里所阐述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不是同意词，而是两种不同的情况。语言的创造性，心理语言学学术语。指语言的创新能力。美国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使用这一术语，不是指一般的推陈出新的能力，而是指说话者创造新句子和句段的潜力。所谓“新”，是指这些句子不是说话者背下来的，而是由于掌握了语言规则以后造出来的，掌握了语言规则就能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说是语言的创造性，不如说是语言的自我创造性，即语言在人类使用过程中，自我根据一开始自有的语言规则和语言体系产生的新的内容，即语言自身具有的潜力，虽然带有人为的影响，但其主要动因还是语言本身的作用。和我们生活联系密切的就是另一种，语言的创新性，同理，用语言的外部创新性来概括更合适不过。首先，语言具有二元性，即结构和内容精神方面的，创新性是指两方面创新，比如一句话一个词，有固定的声韵格式发音方法语调高低构成长短等等，而精神意识存在的一面，就是对应于固定的物质存在，一个相同的言语声音，具有可变而又相对固定的精神和逻辑概念。今天我们去看待创新性，研究语言发展的历史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应用于当今。地理语言学，又或者说是时间语言学，我觉得最可取的地方就在于，它会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影响语言，并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可以说这个理论是不断进步的，是伴随着语言一起进步的。我们今天用这种理论去研究语言。是语言向正确的方向或者说人类共同希望的方向进步，语言的进步又带来该理论的实时更新，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对语言进行一些更改调整，无论带来的利或者弊，都是支持地理语言学这一理论进步的基础。汉语拼音化，是语言在形式结构上外部创新化的一个生动例证，它对语言自身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利有弊的。汉语拼音化可以达到普及汉语的目的，是人只要会读就会写，绝不会出现冷僻字不会写的毛病。也可以与拉丁国家接轨，符合信息现代化的要求。但有声语言生机勃勃，它甚至还有许多“野性”，书面所以需要一套特殊体制，不仅是为了制约有声“野性”，也是因为它难以对付那种活泼性。“亿元、一元”同音，新条件下看不懂不能直录了，于是不能用拼音直接转写“亿元”，必须改写“一亿元”或“一百兆元”了。“千克”作标准计量单位是符合科学语言表达法的，但是“千”的语素作用和构词作用涉及深层语言习惯，因此它的阻力比较大。这只是一个词的变化，拼音化遇到的将是一大堆问题，它们很可能会同时爆发出来。新产生的歧义句式也需要分化，因此要在高层语言体制中做许多调整工作。那种工作的实质是去重新约定，所以需要相当长的社会实践过程。如果允许强大的汉字书面系统与它并存，新约定的需求会难以表现出来。而完全放弃汉字让它进入交际市场去自由调整，恐怕很难预料它不会陷入某种混乱状态。——这是现代信息文明大跃进中世人瞩目的重要课题。汉语拼音化按词连写，多了一层语言信息，但是它照样缺少高层韵律信息，因此词组和句子要借助经验来辨认。实际上即使改进拼音方案，也不能反映全部语音，它不可能跟有声系统完全等价，所以它跟汉字书面语一样，也是一个子系统。拼音化面临的不是直接替换语音的原始任务，让它升格做拼音文字，遇到的是特殊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应付以汉字为基础的书面规范。同音词是靠汉字保护的。设法在拼音中区分它们未必能找到简单而有系统的方法，而分化、限用某些同音词的工作是在改变书面规范。改变书面规范也需要有声语言的支持，要放弃一些说法，采用一些新的说法，难度就更大了。

语言的创新性有利有弊，用当代的利弊去推究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去完善地理语言学，又或是用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来权衡创新的利弊都是可行的，或者说都是应该去做的。

窃以为地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地理条件在改变。时间在改变，语言在改变，语言改变带来地理语言学的改变，地理语言学的完善又反作用于语言的变化，这就是地理语言学最具魅力和生命力的所在。

历时语言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朱笛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历时语言学共分为八个章节，分别是概述、语音变化、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类比和演化、流俗词源、粘合以及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其中概述和语音变化的几组概念在研究思路给了我很大启发，因此将其列出作为概念的初步理解和内化。类比、演化和粘合的概念和分析也是我第一次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拓展眼界和锤炼思维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文学语言与流俗语言

文学语言作为一种依托于文字而存在的语言，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与此相对的流俗语言则没有这种特殊的保证，因此演化的表现更为明显。这一点可以在普通话和方言的演化情况中得到验证。语音和文字较好得到一一对应的普通话，无论在语音还是语法的规范上，均较为固定。而音文对应比例较低的很多方言，保留和传承的难度显然大得多，演变的速度相应地也增加了。文学语言和流俗语言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文学语言混入方言和白话的比例历史悠久且成就斐然，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地域文学和乡村文学都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诸如《海上花列传》等纯用方言写就的作品虽说极少但在文学史上是不可抹煞、极具特色的一笔。雅俗共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甚至是中国自古以来文学的优良传统。《楚辞》同时作为贵族文学和方言文学的代表将楚国方言化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朽的华章，既具有楚国方言特色的表达方式、句型结构、词汇，又蕴含这贵族阶级独特的审美品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诗经》作为平民文学和士人文学的结合体，既来源于民间采风，又兼顾宫廷乐章，代表了文学语言对流俗语言源远流长的人文关怀。而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之中，方言文学的代表莫言等人，将文学语言化为一种大众的、流俗的、又充满哲学思想、审美意蕴的独特个体，将中国白话小说变成美丽动人的村姑和高贵雅致的贵妇的结合体。这不能不说是语言的胜利和文学的胜利。

二、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在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相连续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共时语言学则研究语言状态中共存要素之间的关系。语音学正是历时语言学的头一个对象。因为语音的变化是历时的而非语法的。类比作为语法现象而非历时的现象，它的产物与参照物的关系并不是彼此代替的，也不存在相互接续的关系，纯粹是按照语法的已有形式循规蹈矩地如法炮制。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不能说是一种创新。因为语法规则和结构形式并没有增加。但是这对语言本身的稳定和继承无疑是极大的福音，历时的演化带来的语法关系的割裂和词语意义的断层都可以通过类比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三、自发的语音现象和结合的语音现象

前者的变化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后者则是由一个或几个其他音位引起的。简单来说，自发的语音现象包括两个不同元音的替换，这种替换并没有重读、连读、浊化等关系到其他音位语音变化的目的。结合的语音现象则是有一个联系下的目的，比如为了重读而浊化某个辅音等。汉语中“老虎”“小老虎”的读法显然也是结合的语音现象。结合的语音现象对没一门语言来说几乎都是必然存在的。这既是为了语音表达的清晰明了和便捷，也是人类传达情绪和感情的必然要求。语音不可能没有轻重缓急和语调抑扬，所以语音本身必然存在彼此结合，结合就需要让步和侵占，拉长和缩短，重读和轻读，语言传情达意的本质决定了语音

服务于具体语境的要求，所以语音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语法有时无法兼顾所有语音的要求而出现歧义。

四、语音变化的原因

（一）政治上的稳定和不稳定状态对语言的影响

前者会对语言的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后者则会使语言重新进入自发的变化进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动荡与否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政治的稳定可能会有利于诸如学校等外部条件的稳定而对语言的继承和保存产生积极作用，而动荡的时局则与此相反。但是语音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其发展的历程是复杂的，还需要我们根据其他的因素综合考察。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提到关于异族统治为本民族语言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战争和政权的更迭不只是表面上的国号变更，更意味着一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吞噬，无论这场战争是哪一方胜利，文明高等的一方或许会以另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存留乃至在被动的形势下重回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王朝更替史正是优势文化对异族的不断“化”的过程。但以强盛文明败于落后文明的战争与它的反义词是不同的。这就是近代时期被国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我们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开启白话文时代，正是中国学界意识到一场更伟大的民族文化的革新势不可挡，中华文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上必须脱胎换骨，向世界顶级的先进文明发起猛烈的追赶，直至重回世界文明的顶流。

（二）民族的素质与人种的素质

索绪尔认为，不同人种的发音器官并不会存在先天性的差异，即生理性差异是基本不存在的。气候与土壤等地理环境因素也不能肯定地决定不同语言的发音特征。儿童语音教育产生的误差也不能对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代际差异不存在绝对规律性。那么一个民族语音的独特性即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这就是历时语言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历时语言学可以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散佚的音位变化逐渐串联。这个过程虽然极为艰难，但即使只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我们也能从这个过程中研究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语言存在一个一般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也是索绪尔承认的。在我看来，文化差异是语言差异存在的重要原因，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语言面貌。而生产方式也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

“accent”是语言的特质之一，而这一特质和这一民族的性格息息相关。比如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区别就是一个例子。辜鸿铭先生说“美国人纯朴、博大，但不深沉”而“英国人纯朴、深沉，但不博大”，这体现在英式的拘谨冷淡和美式的热情直白上是很明显的。中国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的不同同样也映照了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但是往往在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显示出不同。比如同样是受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威胁，中国与日本反应方式和速度就截然不同。前者经历了一百年的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近代化的新路，这中间几经坎坷，过程虽漫长曲折但结果却孕育着人类文明新的硕果。而日本则迅速而直接地踏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而一去不返。辜先生说同样是讲礼貌的民族，日本的礼貌是“没有芬芳的花儿”而中国的礼貌是“名贵的散发着香气的香水儿”。这体现在两者关于敬语的使用上，中国人的敬语灵活多变而且重视人情，日本的敬语大同小异且重视形式。

五、粘合和类比

粘合的结果是一种句子中几个要素机械性结合的产物而不会影响到其他，本质是一种多变一，这一过程中最多发生的变化是脱落和拼接。类比却是造成一种带有理性分析和固定法则的一系列产物，比如派生词或复合词。类比在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英语中各种名词、形容词相似的后缀，以及表示否定等意义的前缀等，这无疑是构词法中固有的法则造成的类比的产物。另外，类比对保存一种结构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正是因为其他

统一系列的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才能被保护下来。这就是说，类比系列中的结构彼此验证合理性，并按照已有法则创造新的结构。汉语中的此类现象表面上不如拼音文字一样直接，但细细想来，相似的结构也是很多的。比如“玉山”一词，后来就有人用“玉”加上某个名词的方式给小孩子取名。诸如此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在研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过程中，我产生过很多疑问，也受到很大启发。意识到自己在语音学的研究上尚处未蒙阶段，但我愿意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思路拓展出去，在人类创造的言语的世界里继续我的徜徉。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 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依哈巴拉

经过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我对语言学一般原则有了一些了解。

总的来看，语言学的一般原则首先指出了语言符号的性质，即任意性、线性、不变性、可变性。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语言符号这一概念。语言并非简单将名称和事物联系在一起，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没有指出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到底是心理的，还是声音的呢？其实语言单位是由两项重要的元素组成的，即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二者都是心理的，由联想的纽带连接起来运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用出声就可以在心里进行言语活动，那是因为这些语言中的词已经在我们心中成为了一种音响形象，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心理的。然而，常出现的“音位”这个词则与音响形象这个概念有出入。音位表示声音动作的观念，根据原文来说即“适用于内部形象在话语中的实现。”而我们平时说的“声音”、“音节”则都指的是音响形象。所以，语言符号是一种由概念和音响形象相联系的心理实体。

为了能够在使用语言时更好的区分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选择用一些彼此呼应同时又互相对立的名称来表示他们。“能指”代表音响形象，“所指”代表概念。这样一来，既表明了这两个词彼此间的对立又表示了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在此之后我们要注意语言符号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即符号的任意性。因为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结是任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符号也是任意的。举个例子，树可以由 shu 这个声音来表示，也可以用别的什么声音来表示。这个原则支配了整个语言的语言学，也成为了之后的研究的有力前提。

而当们考虑到一些自然符号时，是否也符合符号的原则呢？是符合的。这类自然的符号即肢体的或表情的等等都是以集体习惯、约定俗成为基础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类符号的概念与表达也都是任意联结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完全任意的符号更方便于表达。

然而“象征”和“能指”是不能混淆的，象征不符合符号任意性的原则，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的联系，就像象征法律的天平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一样。当然这里的任意性并不是指说话者可以任意选择符号，因为符号是由语言集体确定，而是说能指和所指没有现实的自然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更广阔的考虑一些词语。拟声词、感叹词符合符号的任意性吗？答案是符合的。首先来看，拟声词并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它的数量也很少。其次，在某些语言中看似能指和所指有自然联系的某些拟声词，当你追溯它的最初形式时你会发现实际上这只是语音演变的偶然。至于真正的拟声词不仅为数甚少，而且经过不同的模仿，等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定形式时，早已卷入了语音演变或形态演变的漩涡，也服从了一般符号的特征。再看感叹词，仅看不同语言间的感叹词不同便可知道，感叹并非人们的自发表达，也是有着约定俗成的性质的，而另一些带有确定含义的感叹词（例：上帝啊这一类）就更不用提了。总而言之，拟声词和感叹词并不能撼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第二原则即能指的线条特征。能指属听觉性质，有长度且以时间测定，由此可见，它是一条线。一句话被说出时，能指的要素接连出现，而当你把它写在纸上时，空间线条也前后相继出现，可明显地见证此特征。而当言语间增加了重音的情况，实际上只是相邻要素之间的对比，并不像视觉一样展示了多向度的要素，所以还是符合线性的。

了解过语言符号的原则，我们还需了解语言符号的两个性质，即不变性和可变性。

符号的不变性就是说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一旦确定了搭配便再也不能进行更改,那么为什么语言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进行自由的更改呢?第一,接受语言的每一代人对于语言学习是没有偏差的,不存在语言随世代变化而产生的演变;第二,语言的任意性是语言变化最大的阻碍,因为在讨论改变时要以合理的规范为基础,而任意的语言系统却不存在这种规范,为什么这个能指和这个所指搭配在了一起,是没什么道理可言的;第三,构成任何语言都需要大量的符号,而语言的符号是数不胜数的;第四,语言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每个语种的语法都有其复杂的规则,人们即使每天使用某语言,也依旧会存在对于语法的一些困惑,所以想要改变语言是比较困难的;第五,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语言是每天交织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被社会大众使用着的工具,而社会大众的惰性使对于语言的创新成为比较不可能的事。总的来说,对于符号的选择可以是约定俗成的自由,这种选择却也同时在时间中固定下来。

而符号的可变性则是说语言符号或快或慢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人为的。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有着连带关系,符号是连续的,他总处在变化当中,但总是旧有材料占优势,变化的原则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变化指的不是单个能指的语音变化或所指的概念变化,而是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和其他的人文制度不同,正是由于所指和能指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所以有很多因素可造成它们之间关系的转移。所以,语言一方面处在大众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他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

语言符号在社会大众和时间的影响下改变,首先有说话的大众,后有使大众的力量其效力的时间,在二者的作用下,语言就不是自由的了,因为时间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可能发挥效力,而我们就达到了那把自由取消的连续性原则。

这时我们不得不细究此种时间因素干扰下出现的语言符号的二重性。

这种二重性出现在涉及价值概念的学科中,如经济一类,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所以迫于研究的需要,研究者会分出两条轴线: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同时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此线上的事物完全排除时间的干扰;连续轴线上一次只考虑一事物在时间上的变化,于是我们把语言也分出两个学科:演化语言学和静态语言学,也可称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过去的语言学研究不是只着眼于历时状态就是只关注与共时状态,这些研究方法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感到这两类事实的对立,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这二者的运行其实是毫不相干的,历时语言学使语言符号出现变化,而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中两个同时存在的要素间的关系。我们经过对一些例子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历时变化并没有改变系统,它改变的只有要素间的关系。其次,此类的变化当中总带有偶然性,许多单复数变化的符号都是偶然的。最后,两类语言学的秩序是绝不相同的。然而,不管是哪类变化都不会涉及到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到某些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不将他们联系起来研究是很难得出结论的。通过比拟下棋来看待此两类事实,我们知道就像变化的是小棋子,语言变化的是因素,而变化的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变化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只是唯一不同的是棋子由棋手控制,而语言则是任意或偶然地的变化。

在看待历时和共时不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前者对于说话人只是现有符号的由来,而后者对于说话人是现实的规律;前者重在于时间格度上的回溯和前瞻,而后者重在于说话者的观察;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有关概念都无法相互归结。共时事实和历时事实都没有统一的规律,前者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却没有命令的性质,后者虽是强制发生的但变化的类型很多,也不能算是有规律的。而且即使有着语言一定在变化这样的广义的规律,在具体的事实上则是没有规律可言的,所以语言也是没有泛时概念的。

总的来说,语言符号是包括两个内容的,即能指与所指。并且不仅有着任意性、线性这样的性质还有着不变性和可变性这样的二重性质。这个二重性质是由时间赋予的,由此我们